

## 試論真杉靜枝《南方紀行·臺灣の土地》(1941) 的鄉愁內涵

許麗芳\*

### 摘要

本文以殖民者觀察殖民地的內涵與意義為分析主軸，檢視日治時期在臺日本人以在臺日本人作家真杉靜枝(Masugi Shizue, 1901-1955)《南方紀行·臺灣の土地》對當時臺灣之書寫，分析其中的家國認同。皇民化運動之動員下，真杉靜枝以日本人角度所書寫本島人面對語言與文化等價值之重大扭轉下，實際生活面貌與對應態度之一端，尤其關注居於統治地位之日本人基於血緣與國族的認知背景下記錄日治時期臺灣相關政經與生活文化之外，亦得以藉此理解當時來臺日本人面對殖民地臺灣時，所具有的家國意象與鄉愁。

**關鍵詞：**皇民化、國族認同、文化差異、殖民文學、臺灣書寫

---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到稿日期：2013年12月23日。

## The Connotation of Homesickness in Masugi Shizue's *Nanpo Kiko*

**Li-fang Hsu\***

###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Nanpo Kiko*, written by a Japanese settler Masugi Shizu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Taiwan, from a colonist's perspective on the connotation and meaning of a colony. It is intended to analyze the national identity from the writings at the time. Under the Kominka Movement, Masugi Shizue wrote from a Japanese view point about the distortion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values, the realities of actual life and the corresponding attitudes of Taiwanese. It focused in particular on the ruling Japanese identification with blood ties and nationalism and depict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life and culture of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In addition, this study orients towards understanding the images of home, country and homesickness of Japanese settlers in the face of Taiwan.

**Keywords:** the Kominka, identification with nationalism, cultural differences, colonial literature, writings on Taiwan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Received December 23, 2013.

## 前言

本文以日本人作家真杉靜枝(Masugi Shizue, 1901-1955)為觀察中心，檢視日治時期在臺日本人的家國情懷與因之而起的臺灣印象。歷來有關真杉靜枝的研究，或關注其與臺灣之關係、或集中其對於蕃人蕃地之書寫，或與當時其他作家相比較等，論述各有側重。<sup>1</sup>本文則集中分析《南方紀行·臺灣の土地》(1941)的系列散文，<sup>2</sup>此為昭和15年(1940)年底至次年早春數月間，來臺灣探視父母與其妹，並旅行臺灣各地的所見所聞。「臺灣の土地」共十四篇，除三篇小說外，其他則是紀行，分別是〈臺灣の土地〉、〈異郷の言葉〉、〈木麻黃と藝妓〉、〈臺灣女性瞥見〉、〈淡水〉、〈臺灣の果物〉、〈水牛〉、〈南部點描〉、〈移り行く臺灣〉、〈雨〉、〈臺北驛前にて〉等，本文以散文為觀察中心，小說不列入。因各篇散文若干段落文字多有重出，故引用時將有所取捨，避免重複。

本文藉由分析真杉靜枝對臺灣之書寫，以期理解當時日本人如何觀察臺灣，又以真杉靜枝曾於臺灣成長的背景，本文亦關注其人的故鄉所在與鄉愁內涵，並及於家國之認同取向。本文以為，真杉靜枝雖有短暫的臺灣生長經驗，但重遊臺灣的思考中，實際的故鄉與鄉愁，所指向的仍是日本，亦即其所意識到的血緣與家國所在。其中所顯示的認同為身分認同，是個人或群體藉之以和其他的個人或群體區分彼此社會關係的方式(Jenkins, 1996)認同往往建立在與人的差異上，亦即與政治性及社會性息息相關，相關的研究文獻探討認同政治時，往往特別強調認同是流動且被動態建構而成，個人的經驗需要連結到社會結構，才能掌握認同之被建構或重構。藉著人我之間的同與異的區別，認同才被建構而成，<sup>3</sup>但這同與異之被承認與否，其實也與權力之運作有所關聯，而非純然情感導向。對於臺灣，真杉靜枝有多元且複雜的情感，此一充滿成長經驗的殖民地，有其個人情感色彩，然臺灣之於日本，畢竟是殖民地與殖民母國的關係，真杉靜枝於記錄熟悉的故鄉時，也不免也因種族與殖民因素，而有認同與選擇的擺盪牽扯。

### 一、熟悉/陌生：他者的觀看與驚艷

真杉畢生從事文字工作與社會運動，被視為寫實主義作家，<sup>4</sup>創作多關懷自身及女性遭遇及處境。<sup>5</sup>戰時於國策協力的動員下，曾隨日本女性作家報導慰問團至日中戰爭下的廣東，停留約十天，與婦女團體進行救濟五萬多戰爭難民的工作，並於

<sup>1</sup> 有關真杉靜枝的研究如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蜂矢宣朗，〈真杉靜枝と台湾〉，《天理台湾学会年報》第四号，1995；蜂矢宣朗，〈真杉靜枝と窪川稻子〉，《天理台湾学会年報》第六号，1997。李文茹，〈敘述殖民地表象的悲傷與快樂——徘徊於日本與台灣之間的真杉靜枝自我意識形成〉，日本台灣學會《日本台灣學會報》4，(2003.5)，李文茹，〈真杉靜枝戰時下的台灣作品——以久違台灣18年後的作品為主〉，名古屋工業大學「日本比較文學會第18次中部大會」(2004)及林雪星，〈兩個祖國的漂泊者：從坂口子〈鄭一家〉及真杉靜枝〈南方紀行〉〈囑咐〉中人物來看〉，《東吳外語學報》22(2006)等。

<sup>2</sup> 《南方紀行·臺灣の土地》原刊於《月刊文章》七卷四號(昭和16年4月)。本文所引則據真杉靜枝，《南方紀行》昭和書房1941年版，(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復刻版。)《南方紀行》一書分別有「廣東春日記」(9篇)與「臺灣の土地」(14篇)兩部份，其中〈烏秋〉與〈蕃女リオン〉〈阿里山〉三篇是小說，其他則是紀行。「臺灣の土地」系列共有〈臺灣の土地〉、〈異郷の言葉〉、〈木麻黃と藝妓〉、〈臺灣女性瞥見〉、〈淡水〉、〈臺灣の果物〉、〈水牛〉、〈南部點描〉、〈移り行く臺灣〉、〈雨〉、〈臺北驛前にて〉與小說〈征臺戰と蕃女オタイ〉、〈蕃女リオン〉與〈阿里山〉等三篇，散文篇章中相關記錄文字多有重出，本文主要研究散文，小說暫不列入。

<sup>3</sup> Richard Jenkins, *Social Identity* Taylor & Francis Group, 1996, p4.

<sup>4</sup> 見龍瑛宗，〈日人文學在台灣〉，《台北文物》三卷3期，1954。

<sup>5</sup> 如〈駅長の若き妻〉、〈台湾の女性達〉、〈征臺戰と蕃女オタイ〉等作品。

臺灣總督府主導官民合辦的「共榮會」中參與戰地宣撫及報導工作。<sup>6</sup>也因個人的人生經歷，作品中亦有明顯的性別關懷，如《南方紀行·廣東春日記》中〈私の見た陣中生活〉，對於長年離家在域外作戰的日本兵，所遭遇的物資缺乏與懷鄉苦悶之處境，以反省戰爭的意義（頁 104-105）；又如〈仏山へ行く道〉提及，身為一個日本女性，一回想長年離家苦戰之人，臉龐卻還浮現朝氣微笑，不禁聯想起那些把丈夫留在這裏的妻子、那些把父親留在這裏的女兒，以及把兒子留在這裏的母親，一思及此，屬於女性的情感滿溢胸中，淚水也因此湧現（頁 115-116）。如此的反思自覺之下，卻也以女作家支援日本政府文藝部隊之姿，前往中國廣東等戰地，協力戰爭，此亦顯現其中無法避免的日本帝國主義與民族意識之情結糾葛與特定限制，而此也是其人觀察及記錄臺灣的基調。<sup>7</sup>

真杉靜枝於昭和 15 年（1940）年底至次年早春數月間，來臺灣探視父母與其妹，其後旅行臺灣各地並紀錄所見所聞。對於臺灣，真杉靜枝有多元且複雜的情感，此一充滿成長經驗的殖民地，有其個人情感色彩，既是家族生活之地，也是度過青春歲月之所在，<sup>8</sup>然臺灣之於日本，畢竟是殖民地與殖民母國的關係，真杉靜枝雖於臺灣成長，對於臺灣，固然有熟悉的故鄉情懷與記憶，但也因種族與殖民因素，觀看臺灣人事風物之際，亦同時存有一定程度的審思，主要是自我選擇與認同等彼此擺盪牽扯。其於〈臺灣の土地〉自述云：

私は、福井県の田舎で生まれた。

けれども福井のこととは、ほとんど何も知らない。小学の四年位から、大阪へ出て、母方の里になっている家に育った。両親は、私がずっと幼ない頃から、台湾にいっている。それで私も十四のころから、その台湾にいった。故郷といふ感情で私の心にしまひこまれている場所は、やっぱり両親の顔のある台湾である。台湾へゆくと、私のお父などは福井の田舎への郷愁がしきりで村役場などへお歳暮を送ったりしている。

そこに祖父の両親の死んだ家、墓地などがあるので、父にとっては、やっ

<sup>6</sup> 真杉對廣東戰場之觀察，皆寫入《南方紀行》的另一部份「廣東春日記」，其中有所謂「聖戰」與「復興」等對立與矛盾思索。見沼沢和子，《南方紀行·解說》昭和書房 1941 版，（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 復刻版），頁 316-317。

<sup>7</sup> 如金井景子，〈「前線」と「銃後」のジェンダー編成をめぐって：〉，《動員、抵抗、翼賛》，（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 109-115。即提及當時日本女作家投稿雜誌，提出女性於戰時之遭遇或困境，這些女作家亦參與政府戰事協力等活動，而其中如林芙美子即曾於《北岸部隊》中有「不同於看到躺在擔架上的日本兵時，那種出自內心的感傷與崇敬，我對那些死去的中國士兵，竟然無甚反應」這樣的自問自答，此類文字或許顯現當時女性作家的愛國主義，然而同時卻也為國族主義之影響力量提供反省。

<sup>8</sup> 真杉靜枝（1901--1955）為日本福井縣人，父真杉千里為神社神官，一家於 1901 年遷往台灣。真杉曾於豐原就讀小學，於大正五年（1916）畢業於台中看護養成所，當時十五歲。後至台中醫院工作，並加入醫院中的文學團體，十七歲時奉父母之命，與年長十三歲的台中車站助役藤井熊左衛門結婚。因無法忍受如此生活且憧憬文學世界，故於 1922 年離家前往大阪，先是暫居幼年時所生長的祖父母家，而後獨自生活。1924 年為大阪每日新聞社之記者，結交武者小路實篤，1927 年兩人偕往東京居住，真杉開始以個人婚姻與家族經驗創作小說，並與友人創辦雜誌等。1934 年與中村地平同居，並於 1939 年一起前往台灣，中村此行為尋找小說寫作題材，而真杉則是省親，探視生病的母親，距離 1922 年離開臺灣，此次返臺已近十八年之久。1942 年與中山義秀結婚，四年後離婚，1952 年與 1953 年分別至廣島與美國，皆因參與支援原爆被害少女之社會運動，1955 年因肺癌過世。參河原功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別一卷，內地作家）〈內地作家略年譜、作品解說〉（東京：綠蔭書房，1998），頁 587-590。及林雪星，〈兩個祖國的漂泊者：從坂口零子〈鄭一家〉及真杉靜枝〈南方紀行〉〈囑咐〉中人物來看〉，《東吳外語學報》22（2006.3）：43-59。

ぱりそこが故郷となるわけであらう。  
私にとっては、父や母の住んでいる台湾が、故郷ででもあるやうな、なつかしさでしのばれる。  
そして、台湾のこととなると、お国自慢をするときのやうな顔になって喋りたくなるのである。  
この間、その台湾へ出かけていった。この小さな植民地の政治が、いまは大へん複雑になって来ている。  
うわべだけみると、物資にめぐまれてゐるので、土着の台湾人はたいへん金持が多い。ゆったりした物持ちのようのような性格で、台湾人は、生活をたのしんでいるやうにみえる。櫛で梳きたてるやうに、きれいに、役人の手の統治がゆき届いているやうにみえる。あまり、深刻なことは、なさそうにみえるのである。  
中に住みこんで、よくみれば、さうはゆかない、心配な民族問題や何かが宿題としてのこっている。(頁 137-139)

中譯：

我生於福井的鄉下，但對於福井的事物完全不知。從小四年級左右即在大阪母親的故鄉成長。父母親在我尚幼小之際即到臺灣，而我也在十四歲以後前往居住。

在我心中充滿所謂故鄉情感的地方，還是有著父母容顏的臺灣，而前去臺灣的父親，對福井鄉下的鄉愁使他年底時頻繁地至村公所送禮。因為對父親而言，那個有著埋葬父母的墓地才是故鄉。

對我而言，父母居住的臺灣，卻具有故鄉般的追憶與懷念。而且，只要說到臺灣的事物，就像是自豪家鄉事物般的絮絮不休。來到臺灣，但此一小殖民地的政治，卻越來越趨複雜。

只看表面的話，臺灣人因物資之惠，有錢人甚多。因具有儲備充裕物資的性格，臺灣人樂在生活。這似乎是統治者一絲不苟的治理所致。

但持續居住其間，相當嚴重的狀況亦因此顯現，若仔細看，不愉快的、令人擔心的民族問題仍是殘留的課題。(頁 137-139)<sup>9</sup>

所謂故鄉，未必是祖國的特定空間，「對父親而言，那個有著埋葬父母的墓地才是故鄉，對我而言，父母居住的臺灣，卻具有故鄉般的追憶與懷念」，無論是真杉靜枝或其父母，只要是情感所在的父母住所，就是情感的故鄉，只是，不同的情感內涵，親子有不同的故鄉定義與鄉愁。真杉於前段文字中自承對臺灣的特殊情感，但未免又意識到台灣為殖民地以及存有相關問題的現實，於此，真杉則以一定距離的眼光注視皇民化時的臺灣，是以，真杉本人與其父母家族，內在思路皆有兩個故鄉，但彼此卻有層次上的差異，也就是如此的複雜情致，形成真杉靜枝《南方紀行·臺灣の土地》領略臺灣書寫臺灣的基調。

再度返台旅遊的真杉靜枝，由臺灣北部沿著縱貫鐵路南下，筆端觸及基隆、淡水、臺中、臺南與阿里山等地，對於當時的皇民化措施與本島人內地人生活諸面向，皆有所介紹，包括臺灣當時的風土與皇民化的庶民生活。當時的臺灣被日本型塑成觀光地區，建設交通，並結合統治與教育需要，選擇強化日本在臺灣殖民價值的風

<sup>9</sup> 本文所引用真杉靜枝的散文皆已先行中文翻譯，下文不另說明。

景名勝，建立一系列觀光及修學旅行景點，以合理化且普遍深化其殖民精神。<sup>10</sup>在此前提之下，此時的真杉卻以他者的視野觀察曾經熟悉的故里，而非融合於實際的臺灣諸面向，真杉著墨日治時期臺灣的諸多變遷，其於日本人而非本島人的視角下，對臺灣的印象不免是充滿芒果與蓮霧果香的南國風情，亦提及遊覽其間的內地女子與勞動的臺灣女性，且屢見對原住民之摹寫，觀看而非投入的書寫姿態明顯。

真杉以日本人的觀點描述臺灣山川風物之美，以及其間的女子形象，於觀看及記錄中結合了內地與本島的意象，日本價值一直是內在的衡量座標，如〈台灣女性瞥見〉所言，「當前台灣最盛行的皇民化運動應該是最快反映在少女的感受上」(今台湾で最も盛んな、皇民化運動は、かうした少女の心に、一番手早く浸したやうである。)(頁 162-163)，對於洋裝印象的差異，「對老師而言是庸俗的服裝，何時竟成為此間代表內地女性的洋裝」(頁 164) (その先生方の殊更野暮をねらつた洋服はそのままいつの間にかその土地で内地人婦人の洋装を代表してしまつて)。而於〈木麻黃と藝妓〉中，也藉「開叉至大腿的濃豔和服」、充滿官能的手法描繪名為「月華」「梅花」兩位充滿本島人藝妓，一如南臺灣的濃烈與熾熱氣息(頁 160)。如於〈台灣女性瞥見〉中云：

台中の町では、合歡と柳の街路樹や、二筋の美しい川の流れが旅の心にしみ入るのであつた。合歡は、白い花を葉かけに房房と垂らし、風にのせて、甘く薫りの高い花粉をまさちらし、川沿ひに垂れた柳の枝には、若葉がすつかり出そろつて、風にざわめいている。(頁 164)

中譯：

台中讓旅人印象深刻的，是兩條美麗的河川與街道兩側的合歡與柳樹；合歡白色的花低垂於濃密的綠葉間，乘著風散播濃香的花粉，而沿岸的垂柳新葉在風中喧嘩。(頁 164)

而在美麗的城市中，橋面上行走的是優雅的盛裝女子，橋下則是穿著俐落、正在勞動的婦女，其文云：

真白の、のり気のたつた服をつけて、本島婦人が二人で、その川べりに蹲み砧を打つている。

橋の上を、洋傘をきりきりと肩の上にまはしながら、若い内地人婦人が通りすぎたが、その婦人の履いていた、エナメルらしい草履の色が、いかにもこつてりとしていて美しかった。(頁 165-166)

中譯：

年輕的內地女性走過橋上，洋傘緊緊地靠在肩膀上，穿的鞋有若塘瓷的草色，正與其美相互輝映。

兩個穿著雪白俐落衣服的本島婦女蹲在河邊搗衣。(頁 165-166)

這些女性或是內地人或是臺灣人，美麗似為共通的特徵，但身份的不同，也形成不同的內涵，其間內地與臺灣的區別明顯，橋上橋下的時空風情有所差異，相互並呈

<sup>10</sup> 參考劉方瑀，《被選擇的台灣——日治時期台灣形象建構》，成功大學歷史系 94 學年度碩士論文，頁 29-32。陳石煌，《樂園臺灣の姿》（臺北：麗島出版社，1936），頁 79 所列之臺灣各地景點。

對照。而阿里山亦是其著墨焦點，其間的蕃人女子尤其是真杉驚豔之所在，對象是內地人巡查之妻的蕃人少婦，日治時期的蕃人形象隨統治時期而有所變化，日本人對臺灣蕃人的形象塑造由野蠻進至文明，甚至強調蕃人的天真，真杉的文字亦凸顯此一特質，其〈台灣女性瞥見〉云：

阿里山へ登る登山列車は、霧にぬれながら進むのであつた。

三人の先生に引率された、二十人ほどの元気のいい少女達であつたが、トンネルと霧の間を、あへぎ登る汽車の窓で、彼女達は、声を限りに歌ふのであつた。

「蕃人の婦人がいる」私の汽車の中に、そんなざわめきが起つて、みんなが車外に駆け出してしまつた。

駅の前に背の高い、髪を内地の若い婦人がするやうに、無造作に後ろに束ねた婦人がはでなゆかたを着て、背に赤児を負つてたつている。その婦人がふとこちらを見た時、私は思はず声をあげさうだった。鼻の高い面長な顔に、くつききりときつい眉と、美しく幾分けはしい大きな眼をもつた、大へん典雅とも云ひたいほどな美人なのである。(頁173)

列車の窓窓から、いっせいに自分に向けて眼が集まっている、という事を意識していても、その蕃婦はそれを、大変素直な受け方で、まるで生れ落ちた時から馴らされてでもいるほどな無関心さでうけている。しかも、さういう失礼な眼色に対する反撥など、どこにもない姿で、ゆかたの下の地下足袋を履いたすそをさばきながら、「交易所」に何かを運び入れている。(頁173-174)

中譯：

前往阿里山的登山列車染著霧氣行進，約二十名充滿朝氣的少女由三名老師率領，於隧道與霧氣間的登山列車窗邊大聲地歌唱著。

「蕃女！」在我坐的汽車內有了騷動，大家紛紛跑到車外。

車站前站著一位高大女子，頭髮如內地年輕婦女自然綁在腦後、穿著鮮豔浴衣、背著幼兒。當她偶然看向這邊時，我差點沒叫起來。有著高挺鼻子的鵝蛋臉上，鮮明的眉，美麗的大眼，是相當具有古典美的美人。

對於來自車窗眾多望向自己的目光，這個蕃婦相當自在，一付早已見慣無所謂的樣子。而且無視如此失禮的目光，一邊捲著短浴衣下的綁腿長度，一邊不知搬什麼東西到交易所去。(頁173-174)

五官明顯無視觀看眼光的蕃婦引起車內乘客與真杉的注意，如此的注目乃因差異形成的特殊與好奇所致，實為具有異國情調的觀察心態。真杉也藉由小學老師之言，表達對於蕃人女子的關注與好感，其云：

阿里山の頂上に、小学校の先生をしていられるSさんを訪ねしたが、そのSさんも、一人の蕃人女生徒を教へていられる、という話しあつた。「実

によく出来る子供でしてね。何をさせても一番ですよ。可愛くつて、背が大きいので、ひとかどの娘みたいにみえるんですね。いつかも、高等学校の学生達が社祭をみに登って来た時、うつくしい娘がいると騒いでいましたよ。」(頁 174-175)

中譯：

到阿里山頂時，拜訪一位小學老師 S 君，此位 S 老師也教過一位蕃人女學生，「確實是很優秀的孩子，做什麼都是最好的，因為是長得高又可愛的女生，經常引起上山來看社祭的高等學校學生一陣騷動。」(頁 174-175)

蕃人女學生「高又可愛」，往往引起騷動，一如被觀看讚嘆的臺灣風貌，真杉流連與讚嘆阿里山美景，心儀於高山的潔淨空氣與當地人的健康氣色，其云：

阿里山の海拔 8204 尺といふ高さに来て、はじめて、私は台湾の、重重しいねはりのある空気の悪さを忘れた。そのためか阿里山の上でみかけた人々の頬には、みんな、内地の人みたいなバラ色の血色があった。さういへば、台湾の平地では、かういふバラ色の頬を、どんな元気な子供の顔にさへ見ることが出来ない。(頁 174-175)

中譯：

來到海拔 8204 尺的阿里山，總算忘記台灣常有的惡劣空氣，所以，此地的眾人臉頰有著與內地人一樣如玫瑰般的血色。這是台灣平地小孩臉上所看不到的朝氣臉色。(頁 174-175)

真杉的思考中，「內地」與「臺灣」一直相互對照，人物之美不可避免地與土地相比擬，具有明顯的殖民地風情，以及其間的主體客體的差異對立，觀看與被觀看間距離明顯，亦有權力因素，異國情調大於鄉愁認同。真杉眼中的蕃人不似日治初期日本人的觀看態度，當時對生蕃的調查，呈現好奇、驚嘆等具有統治者的眼光與姿態，日人以軍事及知識力量施之蕃人，加以展示觀看。<sup>11</sup>蕃人對其人而言，亦具有異文化的好奇與神秘的吸引力，如此的基本視角直到皇民化時期仍持續，即使真杉因個人家族經歷，對臺灣有特殊情感，卻不免於文字中顯現異鄉與故鄉的交疊情致，臺灣於此，應是有距離感的異鄉。

也因距離有了想像，一如其於〈南部點描〉自言「以旅人的一派輕鬆，欣羨派駐臺灣的日本文官生活的浪漫性」，以為如此的人生流轉具有不同層次想念的詩情(頁 203-4)，文中亦提及北投溫泉，「自然」「閑雅」，「與我所知的內地溫泉風貌並無二致」(頁 206)，溫泉與旅人，於真杉筆下，都深具某種哀愁情懷，然而，對於臺灣風物出塵的美麗，總不忘與日本內地比較，溫泉情致一如內地，而阿里山的清淨美麗，也與日本相同，如此的讚嘆雖是對臺灣的肯定或某種故鄉般的親切，然而，對日本祖國的認同卻始終都在，依舊是衡量審視臺灣地基點，觀看者被觀看的土地存在明顯的距離。

<sup>11</sup> 如鳥居龍藏，楊南郡譯，《探險台灣》，(台北：遠流出版社，1996)，頁 50，「對人類學者來說，正是展開在眼前的、令人驚嘆的研究領域。」甚至押生蕃以調查，(頁 250)，又吳密察〈從人類學者到歷史學者：臺灣研究史巨峰伊能嘉矩〉，《當代》135 期，1998，頁 10-27，「若將來彼等之化育得宜，薰陶得以不失當，則無疑可為順良之民，可為捍護之兵」。其中皆得見當時日人調查生蕃的統治者視角。

## 二、故鄉/異鄉：認同的差異與斷裂

真杉亦意識到殖民地臺灣的語言矛盾與衝突，以及語言所蘊含的文化與家國意義，其陳述個人曾有的語言經驗，進而觀察臺灣學習日語的諸面向，於〈異郷の言葉〉中以臺灣為立場，提及因殖民地緣故，使臺灣於當時的重要與開發及交通地位，因而形成的豐富言語的特殊樣貌，土地上充滿異鄉言語，自然也充滿往來行走的異國之人。其云：

私の両親達は、明治の末期頃から、台湾に住んでいる。それで、私も度度、この島へ出かけてゆく機会をもつわけであるが、この間出かけていった時には、この島の内の気配が、大へん複雑にゆれていた。日本の南方政策の起点になるせいで、南方へ向ってあふれる内地からの人口が、みんなこの島を通過するわけである。開発事業は、この島が根になって沢山興されている。いままでは、植民地として、土地は豊富であるし、わりにのんびりとしていたこの島が、いっぺんにあわただしい時代の台風の下におかれてしまったわけである。（頁 146-147）

ところで、この島を縦に貫いている鉄道の旅客になってみると、さういふいろいろな時代の波を通って来る人、いろいろな地理を経てくる人が、今、実に雑多に入りまじっている。

お国訛だけから云っても、内地からの船で、その日基隆に上陸し南方へ向って走っている人の中には、江戸ッ子から、九州、東北までの訛が入りまじっている。（頁 146-147）

また、声の色あひからいふと、実に、その人その人の経て来ている時代的なちがひなどが感じられる。新しい南方開発にこれから向はうといふ、新鮮な気負に充ちた顔は、しぜんと声が大きくあふれ出ていて、思はず、あたりの人が振り返るほどである。いふまでもなく、国民服に身をかため、たったいまの日本の国策が、その人をかりたてているといった風貌にみえる。この人は、思はずしらず、大声になって話しをしている。

これとちがって、古くから、台湾の開拓事業などにたづきはり、台湾と内地の間を始終往復しているといふ人々の顔には、あまり大声に浮いてしまふことも出来ない現実の底に眼の届いた落着きがある。どこか皮肉味も含まったく、がつしりした片笑くぼで、車内のどよめくやうな、時代的な色彩を眺めているといふ風がみえる。こんな人の話し声は落着いていて簡単な旅行馴れのした静かさがある。それから、この人達よりも、もっと静かで、まるで、半分眠つてもいるやうにきこえる声がある。

台湾に、もう何十年も住んでいる人の話し声である。若い頃から台湾へ来て官吏になっていた人らしい。台湾色の染みついた容貌に文官服を着ている。植民地の、静かな、割りに刺戟のすくない給料生活を、もう何十年といふほど續けて来ている人の話し声は、そのテンポが眠っているやうにゆるい。（頁 147-148）

中譯：

父母於明治末期即到臺灣居住，我也因此有幾次前往臺灣的機會。但此次來

到此地，發現這個島嶼的情況有複雜的變化。因為是日本南方政策的基地，每個前往南方的內地人都會經過臺灣，開發的事業也以這個島嶼為基礎蓬勃發展，以往，這個殖民地因土地豐饒，氣氛較從容，如今，一下子處在在這個慌亂時代的風暴下。(頁 146-147)

縱貫鐵路上的乘客中，事實上很多是經歷各種時代波動或走遍各地的人們。以鄉音來說，從內地坐船，今天剛從基隆港上岸，坐火車前往南方的旅客中，既有東京人，又有九州或東北人等各種口音都混雜其中。(頁 146-147)

而且，事實上，藉由音色音量，也能感受到彼此所經歷的時代差異。正要前往參加南方開發的、滿是新鮮朝氣的臉龐，說話自然大聲，自然，是大聲到令旁邊的人回頭的程度，不用說，就是一身國民服裝，似乎是當前日本國策所鼓勵的。這樣的人不知不覺間大聲地說著話。

與此不同的是，起始即因開拓臺灣事業而往返內地臺灣的旅人臉上，有著不會有什麼可引起高聲的事物般的安定，總是可見帶著嘲諷且沉穩的笑，眺望車內嘈囂的時代色彩。此類旅人的聲音有著習於輕便旅行的安靜平穩。尤有甚者，是聽起來像是快入睡的聲音。那是已經居住臺灣幾十年的人的聲音，像是從年輕時就來臺灣的官吏，容貌帶有台灣氣息，身穿文官制服，已經過了幾十年且還要再繼續下去的殖民地寧靜的新資生活，這樣的人連說話的聲音節拍都顯得慵懶緩慢。(頁 147-148)

來自各地的不同口音日語呈現了南進政策下的臺灣風貌，在所謂前進開發或追尋等氛圍下，臺灣因此具有「嘈囂的時代色彩」，這些往返內地與殖民地的日本人充滿著自信朝氣、高聲地說話，未必有殖民主義或帝國侵略之反省，只有對人生的奮鬥熱情，車船上的日本人操著九州、東北等各地口音，即使是日語也有地區的腔調差異，那些人來往臺灣或以臺灣為跳板前往東南亞，所謂「異鄉的言語」，無論是對來臺灣的日本人，或是對轉往東南亞發展的日本人而言，以及來臺多年、容貌與口音都有臺灣的氣息的日人文官而言，都是不同於本土鄉音的異鄉言語，因差異使得日本的意象更趨鮮明，來到異鄉的同時也凸顯家國的存有，對離鄉的日本人而言，或對真杉而言，殖民地的臺灣，固然是異鄉，但也同時顯現故鄉日本的存有，在如此異質的文化衝擊中，臺灣顯然是異質的表徵，凸顯日本的正當與主導性，也形成日本同化臺灣的精神基礎。

於當時同化政策下的臺灣也有不同的語言經驗，語言政策是殖民時期日本政府對臺灣的主要行政工作之一，<sup>12</sup>至 1941 年四月，全台灣共設有 4875 個部落振興團體。<sup>13</sup>為推動此類草根日語運動，故於部落成立簡易國語講習所，課程上配合農村作息，且為教育更多農村民眾，故大量設立此類講習所。至 1943 年四月，全台灣共有 17248

<sup>12</sup> 日治時期台灣行政單位依次為州（廳）、郡（市）、街（庄），理論上庄是最小行政單位，但日本政府為徹底貫徹政令，庄下又劃分為非正式的行政單位：「部落」，以為殖民政策的最末端組織，1930 年代中期，為加速農村日本化，每個部落陸續設有「部落振興會」，為皇民化時期殖民政府在農村鄉間推行日語的基層組織。台灣總督府編，《昭和十五年台灣に於ける優良部落施政概要》〈序〉，(台北，1940)，頁 2-3。

<sup>13</sup> 台灣總督府編，《昭和十五年台灣に於ける優良部落施政概要》〈目次〉前附表。

所簡易國語講習所，計收有學生 42 萬 7298 人。<sup>14</sup>於「皇民化」政策下，臺灣總督加強推動「國語運動」，即普及日語、普設國語講習所，臺灣人必須面對日語的學習經驗，即使學習成效不彰。<sup>15</sup>真杉的文字也反省了當時臺灣在學習日語成效有限的現象，〈淡水〉一文言其曾至臺南州某郡的國語講習所，參觀國語教學的經驗，其云：

そこの粗末な木造の新築会場に整列した本島人の子供達は郡守、視学、庄長、警察署長などの臨席官のあとに續いて、私のやうな、見馴れない東京女がそこへ乗り込んだのをみると、もうすっかり畏縮してしまった。公学校もまだ建たない山間の子供達を其処へ集めて、オルガン一台を童心へのつながりにたのみながら、国語を教へたのであるが、そのせんせいか本島人であって、国語の發音がまだ中途であるのは、一の恨みであった。この先生の中途な發音による国語だけが児童達の耳を教育していくて、さて、臨席官たちの訓辭になると、てんで、その耳には通じなくなってしまふのである。

「皆さんが、一年間此處に集まって毎日国語を習はれたといふので、私はけふ、その皆さんの成績をひとつ見せて頂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と前おきされて郡守さんは

さ、これは何ですかと、高いところの神棚をさされた。こども達は、束になつたミイラのやうに、その獨特の痩せた表情を、びくとも変へず、まるで何もきこえなかつたやうに眼を見はつて、手をあげない。幾度も、かうした質問はくり返されたが、終わりまで、こども達の表情は同じであつて、教堂は、いやが上にもしんと静まり、一年間教へられたといふ先生が、恐縮げに頭をたれてしまはれるのが、私の眼には痛いほどだった。

さういふ会場の開け放した窓からは、付近の傾きかけた竹造りの農家や、その家の前にたつて手鼻をかんでいる農婦の姿、それから、痩せた農民達よりか何倍か肥つてみえる豚の重々しい足で歩いているのなぞが、陽炎に透けながらみえるのである。(頁 182-184)

中譯：

新建但簡陋的木造會場裏，本島人的孩子們排好隊，看到郡守、視學與警察署長等出席官員後面，有我這陌生的東京女子突然闖進來，都十分緊張。我所拜訪的這個連公學校都還沒有的山區，召集孩子們教國語，只有一台風琴算是可維繫童心的工具。遺憾的是，當地的老師是本島人，國語的發音還不熟練，受這位老師半生不熟的國語的薰陶，孩子們根本聽不懂出席官員的訓話。

<sup>14</sup> 臺灣總督府，《臺灣統治要覽》，頁 52。

<sup>15</sup> 《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4 月 10 日，夕刊，第 2 版。殖民政府的積極推動日語運動，雖使各地都有國語家庭或國語部落，而臺灣「國語解者」比例亦達百分之五十一，但因日語運動的成效是以百分比為指標，且計算時又將國語講習所與簡易國語講習所的學生都算在內，實際上，上完一整年的國語講習所的課程，多數人可能無法說出一句日語。。

「一年來大家每天聚集在這裏學習國語，我們希望能看到大家的學習表現。」

「喏，這是什麼呢？」指著安放在高處的神龕，郡守先生問。孩子們像是木乃伊般，特有的瘠瘦表情絲毫不變，完全置若罔聞的眼神，也沒舉手，無論這樣的詢問重複幾次，一直到結束，孩子們的表情都沒變，教堂越發寂靜起來，教了一年日語的老師，深感歉意般，頭低了下去，一如我眼中的痛。

在此沉悶的會場窗外，附近竹造的農舍與站在屋前擤鼻涕的農婦身影、還有，比瘦小農民不知胖幾倍的豬沉重地移動，這些都在太陽熱氣中顯現出來。  
(頁 182-184)

郡守先生所指的神龕，所使用的日語，並非學童所熟知，而是脫離實際生活的想像世界，語言的強制政策形成文化認同與生活模式的斷裂突兀，一如聽不懂日語的木然孩童所聚集的會場與場外農村農婦的畫面，真杉以極端對比的畫面，置若罔聞的孩童對照室外沉重步履的豬隻，隱約呈現當時臺灣面對日語政策之挑戰與困境。真杉以旁觀的角度展現對殖民政權與同化政策的反省，以極端的對照表現其對於日本於臺灣施行的日語政策之心痛。

即使會使用日語亦不免有錯用的現象，或有日語臺灣化的趨勢，如前述〈異鄉の言葉〉所述，居住臺灣幾十年的文官，早已習慣這樣的薪資生活，「說話的聲音節拍都顯得慵懶緩慢」(頁 148)。真杉指出，鄉下的公學校老師斥責小學生時會將基本動詞同時並用。這類本是對台灣人對象使用的便宜之計而出現的說法或語言，不知不覺也在內地人同伴彼此間使用了。(〈異郷の言葉〉，頁 151) 日語於臺灣不免有日語臺灣化的命運，所謂「變態式的國語」在臺灣社會流行，國語有被臺灣話吸收的現象。<sup>16</sup>「不只是說話的節拍慢，不知何時開始，在台灣已經出現一種台灣化的日語」(けれども、言葉のテンポののろさばかりではなく、台湾には、一種の台湾製の日本語のやうなものが、いつの間にか出来あがっている。)(頁 150-151) 而習得的日語運用於臺灣的實際生活中，亦形成語言與人際關係的不協調或錯誤。<sup>17</sup>同為日本人，晚來的年輕日本人，亦需面對久居臺灣的資深日人前輩那種臺灣化的日語，真杉〈異郷の言葉〉云：

一寸した会話の際でも、東京生活から来たばかりの歯切れをもった若い役人が、下級の老年の、台湾馴れのした、のんびり伸とびさったテンポで話す声に一応の理解をもた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さういふ言葉のテンポののろい、ねつちりとどこか喰込みきった落ち着きのある気風は、とりもなほさ

<sup>16</sup>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出版，2006），頁 412, 432。

<sup>17</sup>周婉窈，《海行今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3），頁 100-102，引用曾任豐原郡瑞穗公學校校長的山崎睦雄所著，《二語併用地に於ける國語問題の解決》，頁 27 及頁 57 與 58 等。山崎以為，語言有三個範疇：家庭語、社會語及國家語。而日語在臺灣的使用範疇以社會語及國家語為主，於此前提之下，產生日語敬語的錯誤使用。大致而言，敬語使用於正式或公共場合，以表尊敬，但對於熟悉的平輩或晚輩講話，則不用ですます。如敬語的錯誤使用，臺灣人多於學校習得日語，為公共且正式之用語，故日常生活使用或家人之間的對話時，則產生如父子間也使用尊敬句型的奇特現象。而對於敬語的正確或自然運用的能力也不算太高。日本人稱為「臺灣日語」（台湾出来な国語）。不僅是日語文法，連概念有是漢語式的，如臺灣小孩常將日語的「薬を飲んだ」（吃藥）說成「薬を食べた」，也將日語的「花が枯れそうです」說成「花が死にました」等。

す、そのまま、台湾といふ所氣風を物語っている、それを、若い方の役人の人は、一応理解することを強ひられるわけである。(頁 150)

中譯：

即使是極短的會話，帶著生活東京而有的口音的年輕官員聽不懂已熟習台灣的下級老年官吏那種悠哉語氣的說話也不行，此種語言節奏的緩慢、絮絮叨叨、也就是從容不迫，年輕的官員就這樣被迫對台灣如此的說話習氣有大致的了解。(頁 150)

長年居處臺灣的日本人，無形中也出現不純正的日語，這應也是另一種異鄉的語言經驗。於此，東京口音與臺灣口音的差異對比是明顯的，在比較中，「東京」「臺灣」界限分明，而前者顯然是純正的代表，後者則是一種變異或不協調。

於〈異鄉の言葉〉中，真杉亦以某德國人為例，說明言語對人之影響，其人會說日語、英語及法語，但還是說德語時最流利，畢竟是故鄉的語言。真杉意識到語言所存有的文化內涵與意義，其云：

日本語を話す時など、やはり、日本の言葉の持つ礼儀の中に入り込むとしながらはなすので、どこか痛しい感じがする位、その人自身の人格が壊されてしまふのである。(頁 143)

中譯：

說日語時，也同時表現蘊含語言辭彙中的禮儀，讓人心痛的是自我的人格因此遭到扭曲。(頁 143)

真杉以德國友人為例，提出語言對個人之影響與意義，也由此反思臺灣人面對使用日語禁用漢語的困境，真杉意識到語言對於人格的扭曲，此時的反省是超越國族情感的。語言與文化息息相關，日治時期的臺灣人沒有日本人的生活模式與文化歷史背景，卻必須強制學習日語，被迫切斷與漢語的文化聯繫，卻又無法真正準確理解日語的文化意涵。此一語言狀況並非是自然而然的發展，而是在殖民者所欲改造的架構下刻意型塑，在「語言同化」下，殖民者將日文定義為官方語言，在大東亞共榮圈的架構之下，日文是唯一的共通語言，同時也是國家精神的象徵，其間存有的是日本人的價值認同，而非臺灣人固有的文化與思考模式，語言做為區判的界線，精準使用與否成為區別異同高下優劣的重要標準，殖民者更可能藉語言灌輸相關的價值認同與意識型態。然而，即使可以正確且流利使用日語的本島人，仍然是被殖民者，不僅本身傳統與文化受到壓抑，也未必受到殖民母國的認同，種族血緣始終是差異及對立的根源，難以超越。

除了語言政策的觀察反省，真杉亦關注臺灣神社的意涵，神社的設立亦為皇民化的具體措施，<sup>18</sup>也是真杉投注情感的焦點，日本殖民政權企圖透過信仰日本神話、

<sup>18</sup> 1897 年日本將臺南「開山王廟」改為「開山神社」，為神社建立之始。兒玉源太郎於 1901 年建立台灣唯一的官幣大社—「台灣神社」，以此建立了台灣各神社的「總部」，代表日本「以教統台」的理念傳揚；其次，祭神已脫離原始自然神怪，而是入祀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皇族的入祀，象徵國家政治權利開始滲透到宗教信仰，神道教也將逐漸成為政治工具。1923 年日本政府頒布的相關法令共有二十八個條文，對於神社之設立、選址、移轉或配置、合併、廢止及社內林木砍伐保護等環境配置亦有所制定，務求神聖肅穆，並界定神社為「社會教化中心」，1934 年以後，日本政府在台灣積極推動建造神社，推行「一街庄一社」，在全島樞要地區建設神社，使島民有敬神崇祖、報本返始之誠，

祭祀天照大神，以凝聚台灣的集體歷史記憶，進而創造一種與日本人共同的歷史起源與話語，從而確立新的身份認同。<sup>19</sup>真杉記錄政策宣傳之下，日本天皇神社及行禮祭神等活動儀式深入臺灣百姓生活諸面向的現象，並強調此類儀式其實是以不同於日本本土的方式加以進行，如〈移り行く台灣〉所言，即使在公車上，一旦經過神社或牌樓，車掌也會刻意提醒，於是車內的學生職員乃至官員等一致脫帽注目行禮（頁 213）。真杉對於臺灣人須向神社鞠躬的強制要求，亦提出反思，外在建設與行為模式得以強迫而立即改觀，但其中卻缺乏歷史經驗與文化認同的感情。真杉以殖民母國的價值認同與殖民本身之反省等複雜心態加以檢視，於〈淡水〉一文云：

台湾の、事務室と名付けられるべき室にはどういう種類の室にも、必ず金様の様に入った「日の丸」を仰ぎみるのと同じやうに、本島人家屋の正廳には必ず白木の神棚を発見する。（頁 180-181）

中譯：

就像凡是可稱為辦公室的房舍，無論是何等類型的房舍，都一定可瞻仰到用金框裱起來的太陽旗一般，本島人家中正廳也都有白木做的神龕。（頁 180-181）

「私は、植民地の人人の生き心地が、想像よりもずっと微妙な切実なところにあるのに打たれるのであった。」

一方、ある厳しい規則的な階律に、きれいに分類され、整理され、号令の下にきっちりと支配される「統治」といふものの美しさに私は、惚れ惚れと心を惹かれる思ひがした。台灣では今統治者である役人の活躍面が、非常な生彩をもって生き生きとしているのである。（頁 181）

中譯：

對於殖民地人民生活本質較想像中更微妙更具體之處印象深刻。  
我對於嚴整規律地、清晰地分類、一絲不苟地統治支配下的美感，是相當心儀神往的。當前於台灣身為統治者的官員之活躍，是相當生動精彩的。（頁 181）

真杉自承對「嚴整規律」「一絲不苟」等日本文化與價值的肯定，也以為這正是形成殖民地臺灣特殊美感的主因，而日本精神在臺灣的具體展現或許就是神社，對日本人而言，對神社鞠躬敬禮是來自內在情感與歷史文化經驗，屬於日本人所特有的精神象徵與生活模式，對臺灣人而言，神社是文化移植的結果，雖也行禮如儀，卻有不同的認知背景。真杉內心既存有對日本精神的認同，但對於日本以相同理念施之於臺灣影響價值認同的現象，也有所反省。其於〈移り行く台灣〉云：

---

使神社能兼作社會教化中心，既推崇敬拜神祇，如此的建設之後作為戰時全台動員的設施。參見陳鑾鳳，〈日據時期在臺神社社域特徵之研究〉，《新竹師院社會科教育系《社會科教育學報》5(2002):92-93。1934 年文社第 504 令指示，「一街庄一社」的政策，既使每一街庄都能有神社，同時亦避免浮濫建社，有害神社之神聖性。次年並指示社內建築細節，如本殿應面朝南方，使參拜者得朝北即日本國土方向朝拜等規制。主要在於振興崇敬神祇之醇俗，涵養國民道德，以為思想引導。

<sup>19</sup>王學玲，〈日據時期「皇民論述」的身份認同策略——以陳火泉〈道〉為主的討論〉，《中外文學》30：10，頁 192。

殖民地らしさ、といふものを非常に沢山瞥見したが、本来の台湾らしさといふ生活は、殆どみることが出来なくなっている。これは、一方から云へば、統治者の功績に依るものだと云はねばならないのであらう。

ある高等教育をうけている、廿才前後の本島人青年の言葉として、私に興味深かった言葉がある。「台湾も、僕達が大人になって、活躍する頃になると、本当に立派な日本的一部分になりますよ。」この人達は、この言葉どほりのことよりほかには、ほんとに、何も理想としていないのを私はみうけるのであった。（頁 210）

中譯：

雖可發現很多殖民地色彩，但原有的台灣式生活完全不得見，另一種說法是因為統治者治理之功所致。

我對一位二十歲左右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所說的話深感興趣，「當我們長大成人，在社會第一線工作的時候，臺灣也有可能變成名符其實毫不遜色的日本的一部分」。

這些人除此類言語外，我沒看到其他理想。（頁 210）

接受日本教育的臺灣年輕人自是認同日本，於其人知識領域與意識型態中，日本價值是據以努力與學習的標準，甚至有「臺灣也有可能變成名符其實、毫不遜色的日本的一部分」如此的期許。臺灣的青年的認同除了個人如何認定歸類自己外，也包含他們是否被他人認定為自己希望歸屬的身份類別，而這樣的自我歸類與他人的歸類往往有社會性或階級性的因素，亦即認同雖有自我的情感導向，但被認同與否卻與權力位置息息相關。

真杉反省臺灣年輕人此類認同以及積極追求的人生價值，而此實統治者於殖民地所欲促進的價值精神之同一。皇民化運動藉教育灌輸、戰爭動員，使本島人產生成為日本人的可能與希望。日本政府尤其注重對臺灣語言及教育的措施，欲從精神上徹底改造臺灣的企圖，不僅在語言文字上，強迫臺灣模仿學習日本，亦同時灌輸大和民族和頌揚軍國主義，此為民族價值之傳輸，亦是有特定意識與目的之傳輸，而非真正之種族同化，政權的維持有賴政治強制力與霸權文化的結合，日本藉由傳統文化與教育的改造，建立一套說服被統治者接受統治的信仰體系，使統治階級在道德與精神上取得勝利與合理化，在形式上與被統治者的利益取得平衡卻又不損害自身利益。<sup>20</sup>

事實上，雖說本島人亦為日本人，但日本與臺灣的真正階級鴻溝在於先天種族血緣，而非後天的民族意識建構，此一衝突形諸於外的，則是日本臺灣風物的突兀，其於〈移り行く台湾〉云：

私は、汽車の窓から、内地ではあまりみかけられない、放し飼ひにした家鴨の群や、佛僧華の花、紫色の雲のやうに霞んだセンダンの花の大木などの、異郷の眺めに恍惚としていたのであったが、その、異郷的風物の中に、大へん沢山の、白い大鳥居が立っているのをみかけた。神社が非常にふえ

<sup>20</sup> 參考葛蘭西著，曹雷雨譯，《獄中札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的文化霸權論述。日治時期有關天皇或日本建國神話的教材及相關價值傳輸，可參見何義麟，〈皇民化期間之學校教育〉，《臺灣風物》36：4，1986；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出版，2006）。

たのである。(頁 211)

中譯：

我從車窗眺望著放牧的鴨群、佛僧華花、有著紫雲般花朵的苦棟樹等內地看不到的異鄉事物而出神，不過，在異鄉景物中卻看到很多矗立其間的白色神社鳥居，神社增加甚多。(頁 211)

所謂「異鄉景物中卻看到很多矗立期間的白色神社鳥居」，臺灣於真杉眼中，畢竟是「異鄉」，神社鳥居則是異鄉中的熟悉景物，在如此的文字陳述中可見，典型的臺灣風物中卻有代表日本精神的神社，為明顯的權力展示，也顯現同化政策的傳輸力量與產生的突兀，一如本島人正廳神龕上的神像與祖先牌位亦被日照天神所取代，其云：

そして、その正廳に祀られている神であるが、いままでは、多く孔子が祀られていた。そして、その前で、金泥のついた紙の束を焼いて祈禱する伝統が繰り返されている。

けれど、近頃は、さうではないのである。必ず「天照皇大神宮」が白木造りの中に祀って安置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るが、孔子と並べて祀っている家もある。(頁 212)

中譯：

而且，正廳供奉神祇，至今多是奉祀孔子，在孔子像前燒金紙祈禱的傳統仍然延續。但是，頃近就不是這樣了，白木做的（神龕）中必定奉祀「天照皇大神宮」。(頁 212)

藉由並置與對比的文字凸顯被殖民者現實生活與殖民者所傳輸的民族精神論述之斷裂與突兀，並以日本政府鼓勵臺灣青年學習敬拜神社與樂舞訓練等現象，再次強調此類不協調：

複雑な意味あひから、神社の存在が、大きな意義をなして來ている。  
本島人青年達は、今まで廟に集まって、支那風な一種の神樂のやうなものを吹奏或は打奏していたのであったが、その代わり、近頃は、青年団の中から、選ばれた者丈けが、一郡に何十人といふほどづつ、神社に集まり、日本の神樂の「笙、笛、大鼓」の教示をうける。

私は、この講習を見学した。公学校卒業程度の、農民の子弟なので、国語も、さう立派とはいへない青年達であるが、彼等は、神社へ来ると、白足袋、白衣白襪を支給される。その扮装をつけると、大へん、立派な神に仕へる姿になり、こころまで、敬虔になるといふのが、神社の神職の意見なのである。「さて、けふから諸君達は、日本の天照皇大神宮さまにお神樂をおそなへ申しあげるための練習をするのでありますから、第一に注意して頂きたいことは、ニンニクを食べないやうにして頂きたい、」

中譯：

雖充滿了複雜的內涵，但神社在此間具有很大意義。本島青年以往聚集廟裡演奏中國式的祭神音樂，最近有所改變，從一郡的青年團中選出幾十人左右，

於神社集合，接受「笙、笛、太鼓」的教育。

我參加了這個講習，因為來參加的年輕人是只有公學校畢業的農民子弟，日語說得不算流利，他們一來神社，就分到白襪白衣與白束帶，一裝束好，馬上變成高尚的神官姿態，也由衷地虔敬起來。而神社的神職人員是這麼認為的，他們說，「因為諸位要練習祭祀天照大神的神樂，第一要注意的是不要吃大蒜……」

神職人員以如此謙遜的語調開始講課，而郡守與視學等也都出席，照例還是在講課中加入訓話。於此種狀況之下，讓我深感有趣的是毫無壓迫的語調，若是在內地的訓練所，還是使用較為嚴厲的語彙，而這裏實際上卻是恭敬地「希望」等謙遜語氣的說明方式，我對主管提出愚蠢的問題，「這需要學費嗎？」「不敢當，這是免費的，對表現較好的也可能支付日薪哦」(頁 214-216)

以神社敬拜與樂舞訓練對臺灣年輕人進行教育，且刻意地以不同於日本的「免費」甚至「可能支付日薪」等操作模式加以獎勵與動員，以藉此傳輸日本人的想法與習慣以進行同化與改造的政策，但就臺灣人而言，神社是不具歷史或文化情感的移植符號，白襪、白衣、白束帶或笙、笛、太鼓等象徵日本的符號僅止於外表，所有的學習僅止於形式的模仿，真正的情感認同顯得遙遠不熟悉。日本與臺灣，是對照、斷裂、習染、沉默等異質關係，日本嘗試以其文化與文明同化臺灣，以改變臺灣的生活情態與精神內涵，對於臺灣人尤其庶民而言，顯然喪失文化認同之主體性，必須接受日本統治者之支配與定義。因殖民者的政治考量，臺灣的外在變化可以是立即或強制的，如臺灣人對神社鳥居敬禮，穿著神官服裝表演神樂，在鄉野田間大量興建神社，設立國語講習所等，然而其間最大衝突是難以親近熟悉的文化，缺乏習染的土壤與認同的情感，差異的界線始終明顯。於此現象中，文化是被抽離的，生活是斷裂的，語言自然也無法深入生活。

除〈淡水〉外，真杉於〈移り行く臺灣〉及〈雨〉等多篇皆提及台灣居民家中必有神龕，以及獎勵對神社鳥居鞠躬的規定，如穿文官服的公務員與一心想著考試的學生在車上看到遠處的神社或鳥居，也都須脫帽致敬。於〈雨〉一文中，真杉以個人經驗與情感反省對神社行禮的現象，其云：

広い神苑をめぐらした神社の鳥居の内にある私の両親のうちに滞在しながら私は一度も、神職の装束をつけた父の背後から、神様を拝んだ、といふことがなかった。父の白装束の生活は、毎朝五時を合図のやうに「祝辞」をあげつつ冷水を身に浴びることから始まる。みていると、このくらい神様に仕へるのに適切な人はいないと思はれるくらい、父の神殿を扱ふ態度は、さながら生きた偉人に仕へるのと同じ感情で、手がこんでいる。かういふ父を、十六年も両親達をはなれていた私は不思議な人を眺めるやうな眼でみていながら、一度も、私自身が、その神殿の方へ歩み寄ったことはなかった。

皇民化運動のスローガンを事変に対処する植民地統治に使っているので、今は恰度神社が台湾統治の上に重要な位置におかかれている。先づ附近の本島人や内地人、役人も町人も、神社の鳥居の前を通過する時は、必ず脱帽することが奨励されている。そんなわけで、滞在中私にあてがはれた勉強

部屋の窓からみていると、ずっと向ふの鳥居の前を通ったり、その下を出入りしたりする人は、どんなに自由主義者らしい風貌の人も、必ず最敬礼をして通る。けれども、私にも、滞在中それがなぜか為しにくくて困った。人が見ていないか、と恥しくて、礼をするにしても太い鳥居の柱のかげに身をかくすやうにして頭を下げた。

しかし、発つ朝は私は、どういふわけか、とても素直な気持で、鳥居の下に立ち、胸のふくらむやうな抑しあげてくる感情を味合ひながら、心から神殿のかたに頭を下げてしまったのである。

「それがもう見納め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やうな、別れ際の断ち切れた感情で、どんよりとしたあたりの景色と、肉親たちの顔とを心にかき集め、頭を下げる神様が、そこに鎮座されていることが、ほっとするやうに有難かった。(頁 219-220)

中譯：

雖然暫居在寬廣神苑圍繞的神社的父母屋舍，但我從未在穿著神職服裝的父親背後參拜，父親白色裝束的生活是從每天早上五點像是信號般的邊誦「賀詞」，邊向身上沖冷水這些事開始的。應該再也沒有這樣適合服侍天神的人了，父親維護神殿的態度，就如同服侍活生生的偉人一般，程序繁複仔細，已經離開父母十六年的我以奇特的眼光望著如此的父親，卻一次也沒接近神殿。

因事變而使用於殖民地統治的皇民化運動的口號，恰使神社在統治臺灣上據有重要位置。現在獎勵當地的本島人、內地人、官吏或商人等經過神社前一定要脫帽致意，因此，暫居的我從讀書的房間窗口遠遠望去，從牌樓經過或出入的人、即使看似自由主義者也都一定敬禮。但居住其中的我，卻無法也如此做，怕有人看見，即便行禮，也只能在牌樓鞠個躬而已。

但是，在即將動身的早晨，我不知何故，壓抑著心中的激動，站在牌樓下，衷心地對神殿低頭致意。以一種「也許是最後一眼也說不定」、即將離別時特有的灑脫，心中充滿著至親的面容與灰暗的景色，因有可以低頭致意的神之存在而感到幸福。(頁 219-220)

因父親為神官，真杉靜枝對於神社自不陌生，卻未必具有特殊或深刻的情感，其父居住台灣幾十年，既是教授台灣青年神樂的神官，也協助各地建神社，而其妹服務的公學校及所謂的成人講習所，家族皆熱衷於促進日語教育及改日本姓等運動。<sup>21</sup>臺灣之於真杉家族，可說是某一亟需改造的客體，但對真杉靜枝個人而言，則是既貼近卻又遙遠，一如其言，有故鄉般的情感，卻也不免具有日本人之本位思考，亦曾於協力國策動員下參與戰爭的後援與宣撫工作，但對於臺灣此一殖民地，卻也多少具有客觀批判。

真杉自述，一向羞於向神社行禮的態度，卻因即將與父母家人分別而有了不同的情感流露，神社與鳥居，成為故鄉的具體象徵，神社本為動員本島人而設，藉以傳輸日本的國族價值並形塑文化認同，另一方面卻也成為在臺日本人鄉愁之所在，成為懷鄉之意象。「在即將動身的早晨，我不知何故，壓抑著心中的激動，站在牌樓

<sup>21</sup>沼沢和子，《南方紀行·解說》（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 復刻版），頁 316-7。

下，衷心地對神殿低頭致意。以一種『也許是最後一眼也說不定』、即將離別時特有的灑脫，心中充滿著至親的面容與灰暗的景色，因有可以低頭致意的神之存在而感到幸福。」因有可以俯首致敬的神社而感到幸福，於此，真杉似乎展現了真正的家國情懷與認同，所謂的故鄉，不只是父母所在之處，也是文化與情感所認同的日本。

就真杉靜枝而言，故鄉既是臺灣，但更是日本，更具體的是，只要是神社之所在，就是鮮明的鄉愁之所在，日本於其人而言，是無法抹滅的血緣故鄉，是情感認同的最終歸向，臺灣則是殖民政治所形成的人生歷程中另一故鄉，具有後天的想像前提與建構。因殖民的歷史使然，在其人認知內涵中，兩個家國的符號與時空相互重疊，顯然有個人複雜且獨特的思索，然而，在文化、語言等異質衝突中，真杉靜枝的認同仍趨於一端，也就是日本的價值，臺灣之所以也是故鄉，在於父母家族生活此間，而非對臺灣風土有特定認同，或視臺灣純然為日本的一部分，真杉靜枝如此的觀察角度與文字書寫，或可見當時在臺日人某種家國認知與想像。

### 結語：異質對照下的認同強化

真杉靜枝以對照的眼光觀察曾經生長的故鄉及殖民地臺灣，以反思的基調書寫《南方紀行·臺灣の土地》。以客觀卻亦關懷的角度來看待臺灣皇民化生活諸面向，既肯定日本對殖民地的內地化與現代化，其間也以情感角度，嘗試從殖民戰爭的角度，記錄其旅行這個南方異鄉的諸事物。<sup>22</sup>描繪臺灣的文字，往往僅為讀者提供畫面，且是遠觀的角度所形成的畫面，被觀看的人事物多半是遙遠陌生或無言漠然的，偶而透過側面的言語取得約略的理解，然而，發言者始終為真杉靜枝，以其日本人的認同自覺書寫記錄，於其筆下，臺灣的藝妓、蕃人少女或內地女子各自有其人生姿態，而欽慕阿里山所代表的臺灣之美的同時，亦不忘比擬祖國日本之美，臺灣的人事之美固然值得讚嘆，亦是其相對熟悉的故土，但書寫與觀察卻始終維持一定距離，終究保有殖民者與殖民地的相對關係。

另一方面，真杉靜枝亦以其反省的角度，觀察臺灣的殖民地現象，如對於日本在臺灣之「皇民化」、「工業化」與「南進基地化」等政策，以及積極設立神社與促進國語（日語）教育為主軸的皇民化措施，真杉靜枝也呈現個人的相關反省，以及皇民化的臺灣隱含多重面貌的生活諸面相，也意識到所謂民族問題仍是殘留的課題，認同的鴻溝與斷裂始終存在。

真杉靜枝以對日本為角度，書寫曾經熟悉也具有某種認同的臺灣，因此，與其說記錄當時殖民地臺灣的皇民化諸面相、庶民的心境與生活之摹寫，毋寧說表達了身為日本人的真杉之某種鄉愁內在，對真杉而言，臺灣雖熟悉卻也遙遠，因家族的生活其間，因日本象徵的神社存在其間，使臺灣因而有了意義，但臺灣始終是臺灣，而未能真正成為日本的一部分，所以真杉有其矛盾與選擇。內地人與本島人，統治與被統治、內地與本島、故鄉與異鄉，彼此的對立、距離的鴻溝依舊存在，認同內涵與情感歸向，也各自分歧，各自詮釋，日本同化臺灣之同時，也一再強調臺灣的異質與邊緣，於特定歷史時空中，在臺灣的日本人用以對照衡量的日本價值座標始終存在，成為觀察與判斷各種異質性的主要視角。

<sup>22</sup> 沼沢和子，《南方紀行·解說》，頁317。

## 參考書目

### 一、近人著作

- 真杉靜枝：《南方紀行》昭和書房 1941 年版，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 復刻版。
- 河原功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別一卷，內地作家）〈內地作家略年譜、作品解說〉，東京：綠蔭書房，1998。
-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9。
- Antonio 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曹雷雨譯：《獄中札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 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3。
- 陳石煌：《樂園臺灣の姿》，臺北：麗島出版社，1936。
-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
- 鳥居龍藏，楊南郡譯：《探險台灣》，臺北：遠流出版社，1996。

### 二、專書論文

- 王學玲：〈日據時期「皇民論述」的身份認同策略——以陳火泉〈道〉為主的討論〉，《中外文學》30：10。
- 台灣總督府編：《昭和十五年台灣に於ける優良部落施政概要》（序），(台北，1940)，
- 李文茹：〈敘述殖民地表象的悲傷與快樂——徘徊於日本與台灣之間的真杉靜枝自我意識形成〉，日本台灣學會《日本台灣學會報》4 (2003.5)。
- 李文茹：〈真杉靜枝戰時下的台灣作品——以久違台灣 18 年後的作品為主〉，名古屋工業大學「日本比較文學會第 18 次中部大會」（2004）。
- 吳密察：〈從人類學者到歷史學者：臺灣研究史巨峰伊能嘉矩〉，《當代》135 (1998)。
- 金井景子：〈「前線」と「銃後」のジェンダー編成をめぐって：〉，《動員、抵抗、翼賛》。
- 林雪星：〈兩個祖國的漂泊者：從坂口零子〈鄭一家〉及真杉靜枝〈南方紀行〉〈囑咐〉中人物來看〉，《東吳外語學報》22 (2006.3)。
- 何義麟：〈皇民化期間之學校教育〉，《臺灣風物》36：4，1986。
- 陳鑾鳳：〈日據時期在臺神社社域特徵之研究〉，新竹師院社會科教育系《社會科教育學報》5(2002)。
- 蜂矢宣朗：〈真杉靜枝と台湾〉，《天理台湾学会年報》第四号，1995。
- 蜂矢宣朗：〈真杉靜枝と窪川稻子〉，《天理台湾学会年報》第六号，1997。
- 蔡英文：〈認同與政治：一種理論的反省〉，《政治科學論叢》8 (1997.6)。
- 劉方瑀：《被選擇的台灣——日治時期台灣形象建構》，成功大學歷史系 94 學年度碩士論文。
- 龍瑛宗：〈日人文學在台灣〉，《台北文物》三卷 3 期，1954。